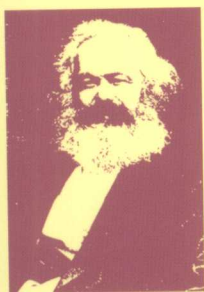




20世纪 西方马克思主义 哲学历程



The Journey of the Western Marxist Philosophy in the 20th Century

陈学明◎主编

第二卷 20世纪下半叶

三大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的部分“合流”
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多元化格局的形成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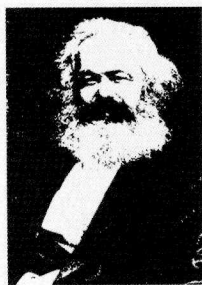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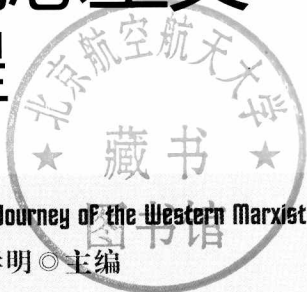
013029807

B089.1
60
V2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20世纪 西方马克思主义 哲学历程



The Journey of the Western Marxist Philosophy in the 20th Century
陈学明◎主编

第二卷 20世纪下半叶

三大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的部分“合流”
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多元化格局的形成



北航 C1635502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B089.1
60
V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 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历程. 第 2 卷, 20 世纪下半叶三大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的部分“合流”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多元化格局的形成 / 陈学明主编. — 天津 :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3. 2

ISBN 978 - 7 - 201 - 07873 - 1

I. ①2… II. ①陈… III. ①西方马克思主义 - 研究 - 20 世纪 IV. ①B089.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08775 号

目 录

卷首语	1
第一章 社会党理论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评与修正	32
第一节 勃鲁姆塑造了法国社会党修正主义的精神和气质	37
第二节 克罗斯兰提出“社会主义 = 凯恩斯经济学 + 福利国家 + 平等 + 混合经济”	43
第三节 迈尔断言社会主义运动已经证明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取得了全面胜利	50
第四节 吉登斯倡导当代西方“第三条道路”以及对唯物史观的当代批判	56
第二章 西方共产党的理论家在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的总目标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探索	66
第一节 加罗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注重批判性和主体性的论证	68
第二节 塞夫提出“科学的人道主义”和“科学的人格心理学”	75
第三节 卡里略对马克思主义国家与革命理论的新探讨和对“欧洲共产主义”战略的设计	83
第四节 霍夫曼、韦丁顿等英国共产党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捍卫与探索	91
第五节 施莱夫施泰因和桑德屈勒等联邦德国共产党理论家在反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	99
第六节 塞尔沙姆、威尔斯、雷诺兹、帕森斯等美国共产党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和对当代资产阶级思潮的批判	106
第三章 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的新发展	114
第一节 晚年阿多诺的辩证社会学和否定辩证法	115
第二节 晚年马尔库塞的爱欲解放论和批判当代工业社会的“单向度”理论	128

第三节	晚年弗洛姆对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的研究	140
第四节	施密特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的研究	157
第五节	哈贝马斯对原先的社会批判理论的系统修正和发展	168
第四章	第四国际的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探讨	187
第一节	托洛茨基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及其从这一研究中 引出的“不断革命论”	188
第二节	曼德尔论经济学的哲学	210
第五章	西方马克思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	230
第一节	吕贝尔对马克思的总体评价	237
第二节	费切尔以马克思早期著作的人道主义思想来解释全部 马克思的学说	243
第三节	麦克莱伦对马克思意识形态观的源起和流变的探索	249
第四节	安德森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探讨	258
第六章	流亡西方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 ..	270
第一节	赫勒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270
第二节	科拉科夫斯基带有强烈“新马克思主义者”印记的对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	279
第三节	齐泽克不断地提出新观点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 ..	288
第七章	解放神学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的融合和互动	310
第一节	从古铁雷斯的论述看解放神学运动的起源	313
第二节	古铁雷斯论解放神学的主题——救赎与解放	320
第三节	洛威和奈格里论解放神学与马克思主义	330
第八章	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通过对“世界体系”的分析对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创新	339
第一节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	344
第二节	阿瑞吉的世界体系扩张理论	358
第三节	阿明的“批判的不平等理论”	376
第四节	弗兰克的依附理论	394

卷首语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以电子技术为基础的工业革命,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设施变成了一个自动化的体系,从而使生产力获得大规模的发展,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虽然并未根本改变,但西方社会阶级结构以至整个社会生活却发生了某些变化。正当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出现这些新变化之时,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却经历了由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所引起的社会动荡,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这一新动向反过来又影响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出现的一系列新变化的本质是什么?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人们究竟是处于太平盛世还是仍然陷于深刻的危机之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究竟还有没有优越性?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究竟是什么?这些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面对的问题。20世纪下半叶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在面对这些问题的过程中走过来的。各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流派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以不同的方式企图在理论上对这些问题作出阐述,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发展趋向。

20世纪上半叶,西方世界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存在着三大解释路向:其一是由伯恩斯坦、考茨基等开创,后由社会民主党所奉行的第二国际传统的解释路向;二是发端于俄国、苏联,被西方共产党所遵循的第三国际传统的解释路向;三是由卢卡奇、柯尔施等提出,后被法兰克福学派所继承与发展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解释路向。我们在这里先看一看这三种不同的解释路向到了20世纪下半叶以后的新动向。



20世纪下半叶,第二国际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路向演变为一种民主社会主义理论。1951年,各社会民主党重新集合在一起,成立了社会党

国际。在社会党国际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这标志着以伯恩斯坦修正主义为源头的民主社会主义开始成为西方诸社会主义政党信奉的主要理论。这意味着:其一,社会民主党的指导思想已完全非马克思主义化。到了50年代末,除了英国之外的几乎所有西欧社会主义政党都直接或间接地抛弃了它们在19世纪末正式采纳的马克思主义。其二,社会主义理论的价值化和伦理化。随着社会民主党的意识形态的淡化和退却,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克服资本主义问题的社会制度的理解开始退出政治舞台,而逐渐为一系列伦理化的价值或理念原则所替代。第二国际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路向,演变到这里已很难说还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严格地说,它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或者说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流派。他们的理论家仍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许多研究,但主要是立足于批判和否定的研究。而他们攻击科学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目标可以汇聚于一点,即否定资本主义社会的消亡或对资本主义所存在问题的克服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实际上,这一目标在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出现时就已形成,但到了20世纪下半叶,才完全系统化并发展到极致。随着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被否定与摧毁,社会主义在他们那里最终演变为只是有着人道主义关怀的一系列价值清单,演变为一种“能够产生一整套社会主义的价值”的道德理论,或者说一系列参照“民主的、社会的价值”的纯粹“思想启示、生活方式和行动方法”。

勃鲁姆是一位奠定法国社会党的思想和政治传统的理论家与活动家。虽然他的生涯主要集中于20世纪50年代以前,但是法国社会党修正主义的精神和气质几乎都是由他塑造的,他使法国社会党成为民主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不仅如此,勃鲁姆的思想还反映了法国乃至西欧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完成了由马克思主义向修正主义蜕变的过渡状态。勃鲁姆的思想在本质上是以饶勒斯的人道思想为基础,来补充和修正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所阐明的社会主义不仅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运动的必然历史结果,而且也是理性、自由、平等和正义等人道价值的体现,是这些价值和原则的社会或政治实践。他指出,马克思主义作为揭示历史规律的学说,作为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工具,作为涉及历史的哲学,自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要将马克思主义当做某种解释世界的“形而上学”,当做世界观和认识论,像苏联的马克思主义那样将马克思的思想体系化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那么这种做法是不能被接受的。

克罗斯兰是战后英国工党重要的理论家和政治活动家,也是当代西方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代表人物之一。他提出的社会主义的著名修正公式——“社会主义=凯恩斯经济学+福利国家+平等+混合经济”——对西方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克罗斯兰断言,现实资本主义在经济社会上的表现已经远远超出马克思的估计,因而那种资本主义会随着社会生产力冲破资本增殖力的桎梏而导致自我消亡的预言,已经失去历史根据了。通过对社会主义史的理论考察,克罗斯兰将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诸制度性诉求降格为实用性的手段或途径,从中抽绎出社会主义的一般性原则和价值理想,从而完成了对社会主义内涵的价值或伦理修正。克罗斯兰强调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其实是以社会大众为基础的“广泛的人权运动”,是人道主义价值的社会化实践。为此,克罗斯兰提出了他的著名的“新社会主义模式”,即社会主义的修正模式:①自由的民主制,②混合经济,③发达的福利国家,④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和财政政策,⑤社会平等的概念。

迈尔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当代的重要理论家,是在苏东剧变之后“第三条道路”的著名倡导者之一。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迈尔是一位继承伯恩斯坦衣钵的修正主义者,并断言一个世纪以来的社会主义运动已经证明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取得了全面胜利。迈尔主张应当以社会民主主义这一提法来替代民主社会主义,因为民主是社会化的组织的唯一合法性原则,是人的自由和平等在社会组织和团结上的基本表现。社会主义所坚守的价值理想其实就是自由主义所依据的基本政治原则,即一个实现人的自由和平等的社会。迈尔认为,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严格的科学,从中引申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以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为政治上最基本的方针或行动纲领,是马克思主义那些错误的、成问题的内容和倾向的极端反映。对于苏东剧变,迈尔认为,这是“共产主义的社会模式”的历史性失败,是“民主社会主义对它的历史性批判”在实践中的证实。

吉登斯是当代西方“第三条道路”的著名倡导者之一,也是民主社会主义在当代西方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吉登斯以研究现代性理论著称,但他认为,马克思所分析和揭示的资本主义并不能涵盖现代性的全部内容,也不能囊括对现代性认识的所有方面。尽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作的深邃分析的确揭示了现代性的一些基本特征,但它同时有着一种还原论的危险,即将现代性的起源、问题和本质仅仅归结到资本主义这一单一因素上,又将社会历史的复杂性还原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简单性分析,这使得他对解放政治的开启仅仅局限于作为资本主义之反题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而且将这种

似乎是抽象性的共产主义作为历史的必然归宿强加在历史的目的之上。吉登斯致力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在他看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历史的理解和认识存在着诸如“还原论”、“进化论”和“功能论”等问题和缺陷,这些问题都是有待反思和重建的。吉登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的基本路径是将马克思的历史科学降低到知性水平,然后反过来用知性化的社会学的一系列问题和矛盾来批评和责难马克思。吉登斯的生活政治或乌托邦现实主义,作为对解放政治的反思性改造,是一种“中左”(center-left)政治学,这一政治学正好与西方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潮和改良性或民主化的社会主义实践相契合,这一契合特征主要表现为他为“第三条道路”所作的论证上。

二

如果说在20世纪上半叶,西方共产党的理论家主要是固守第三国际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路向,即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那么到了20世纪下半叶,他们则逐渐偏离了这一体系。他们大多加入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人道主义化,或者说用人道主义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行列。苏共二十大影响到了西方共产党理论家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和研究。苏共二十大之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的立场、观点、主题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变,加上五六十年代新兴科学技术革命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阐释与上半叶相比显示出不同的特征。第一,这些共产党的哲学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教条主义,以一种批判的、发展的眼光研究马克思主义,对于列宁,尤其是对于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进行了批判性反思。第二,这些哲学家对于西方各种哲学思潮拥有了更加开放的心态,往往能够在分析比较中吸取当代思想,而不是以非此即彼的态度对待当代西方哲学。他们在坚持哲学党性原则的同时,抽象的意识形态化批判逐渐减少。第三,如果说上半叶的理论家更多的是对斯大林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和普及,60年代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斯大林的解释模式,哲学家们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中寻找新的思想资源,比如突出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想,以便从理论上反思实践中非民主的、专制主义现象等。第四,由于反对教条主义的需要,20世纪下半叶西方共产党哲学家们大多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在利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批

判当代西方哲学的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被理解为一种具有强烈自我批判性的实践哲学,哲学家们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和局限性。第五,与20世纪上半叶注重辩证唯物主义的倾向不同,到了下半叶,对于实践中存在的现实问题,虽然哲学家们大都仍然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但与历史唯物主义相关的问题受到了普遍关注,变得更加突出,国家、民主、战争、专政等问题都或多或少地成为理论的主题或思考的重要背景,探索一条不同于十月革命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更是成为理论的焦点。当然这些理论家都能够较为辩证地看待苏联道路的历史功过,而不是一味地否定。第六,与20世纪上半叶为了共运的实践需要,主要是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而著作大都具有大众化的特点不同,下半叶的西方共产党理论家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更加专业化、学术化的特征,不论对于西方哲学思想的吸收与批判,还是对于新兴自然科学成果的关注都更加积极,也更加深入和具体。以法国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和西班牙共产党为主所形成的“欧洲共产主义”思想政治路线,则标志着西方共产党已远离原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而将自己的思想政治路线深深地根植于传统的人道主义意识形态之中。在一定程度上,西方共产党理论家的理论趋向逐渐向社会民主党靠拢。

法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法国著名哲学家加罗蒂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人道主义化的主要代表人物。加罗蒂在《人的远景》等著作中抛弃了以前的正统理论立场,极力建立一种具有自己鲜明特色的、科学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批判那种将人道主义当做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因而同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的观点,与主张马克思主义是“非人道主义的”的阿尔都塞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为了反对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教条主义和科学主义的解释,他提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实践的、批判的哲学。在他看来,这一基本的特征贯穿于整个马克思主义体系之中,如果不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把它变成一个僵化不变的、具有绝对真理性的教条主义的科学体系,势必阻碍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批判的思想同教条主义是根本对立的。加罗蒂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不仅是人类的制度和发展规律,还是整个一切现实的发展规律,即自然、历史、思维的发展规律。加罗蒂坚决地批判了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既然是一种批判的哲学,那就必须放弃自然辩证法的观点。他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将恩格斯和马克思对立起来的看法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不排斥自然辩证法,而且必须将它包含在内。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往往从马克思青年时期的作品出发,通过对其作品中异化范畴的阐

释,形成一种资产阶级的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否定自然辩证法的存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又常常将人道主义看做资产阶级的哲学而完全加以拒斥,否认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任何联系,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反人道主义的理论。加罗蒂结合人道主义的发展历史和对马克思异化范畴的解释,从理论上批判了这两种理论倾向,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真正的人道主义,它并不因为强调阶级斗争和技术的发展,就忽视和抹杀人的主观性、个人的内在性、个人自由。

塞夫是法国共产党的另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围绕着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塞夫曾同阿尔都塞展开争论,他认为,哲学与科学在研究的任务、目的和职能上都有明显的区别,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物质与意识辩证统一与差异关系的理论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它所追求的真理也不可能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真理,但这绝对不意味着它与自然科学是相分离甚至于是相对立的。塞夫在《马克思主义中的人的概念和个性心理学》一书中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人的概念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既涉及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内容和它的科学性,同时也涉及青年马克思哲学人道主义著作和成熟时期科学著作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对于理解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性质及其历史地位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塞夫甚至认为,人类的个体性问题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核心问题,是建设无阶级社会的核心问题。塞夫强调指出,成熟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放弃了人道主义的主题,而是在批判抽象人道主义的基础上,在科学的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了科学的人道主义,他不是放弃而是科学地改变了人和人道主义的概念。作为著名的心理学家,塞夫对现代心理学理论和历史发展有深入的研究。塞夫认为,马克思主义对人格心理学的贡献并不只在方法论的指导上,更重要的是它通过历史唯物主义为心理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认为从历史唯物主义对人类个性进行分析,可以避免像“资产阶级理念主义”那样主张个性的先验性,也能避免虚假的唯物主义将人格理解为一种简单的附属现象,还能避免人道主义修正主义倾向于唯意志论的解释。

西班牙共产党著名领袖卡里略是“欧洲共产主义”的首倡者之一。卡里略1977年发表的《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通常被看成“欧洲共产主义”的“圣经”,卡里略也因此成为欧洲共产主义最著名的理论家,尽管他本人声称决没有把自己看成一个理论家,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工作者。卡里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最有影响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研究

究,他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本质上将国家看成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特别强调的是国家的暴力和强制性质。今天的国家当然还拥有强大的暴力机器和强制职能,但其构成和职能以及实现其职能的方式都要比三位导师所了解的复杂得多,差异大得多,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有了不同的特点。卡里略从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来探讨实现共产主义的道路,提出了不同于革命和专政的民主化方式。在卡里略看来,列宁说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本质必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说法只有一半的道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重要的是以民主的方式确立劳动者的领导权,并且以民主的方式实现这种领导权。卡里略认为,“欧洲共产主义”道路,是一条特殊的道路,当然只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多样性道路中的一种,它不同于暴力革命的经典道路,但也不同于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欧洲共产主义”道路同十月革命道路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区分是卡里略力图澄清的重点。

三

比起第二国际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路向和第三国际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路向,“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路向在20世纪下半叶的西方世界,发展更迅猛,所产生的影响更大。如果说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三种不同的解释路向在西方世界呈“三足鼎立”之势,那么到了50年代以后,从理论研究这个角度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世界则后来居上,独占鳌头。“西方马克思主义”原是一股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但在50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又出现了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潮,而且就“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潮而言,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又有了新的扩展,除了原先的法兰克福学派之外,又涌现出新的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派别。鉴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下半叶的错综复杂的发展走向和影响之深远,我们将专设一卷(本书的第三卷)来评述“西方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下半叶的新发展,在这里我们仅限于探讨20世纪下半叶的法兰克福学派。无疑,法兰克福学派不仅在20世纪的上半叶而且在下半叶都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影响最大的流派,总的来说,它代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趋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应西德政府邀请,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人由美国回到西德,在法兰克福重建社会研究所,由霍克海默、阿多诺分任正副所长。不久,霍克海默就任法兰克福大学校长,研究所由阿多诺单独领导。在此期间,马尔库塞、弗洛姆

等则继续留在美国,他们的研究与在西德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遥相呼应。这一时期,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极盛时期,是它走向广阔的国际舞台的时期。在方法论上,它通过与实证主义的论战进一步激进化。在哲学基础理论方面,它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主义等更加紧密地糅合在一起。在社会理论方面,它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又进而对社会中各种政治力量进行分析,提出了“革命新理论”。由于“革命新理论”的提出,法兰克福学派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它作为一个纯学术派别的特征,它的理论走出学院书斋,开始对社会发生实际影响。

阿多诺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逐步从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个重要成员变为领军人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西方世界爆发了轰动一时的实证的社会学与辩证的社会学之间的论战,阿多诺是代表后者进行论战的主将。他在批判唯科学论和实证论社会学的过程中提出了“辩证的社会学”。可以把他的辩证的社会学归纳如下:对象——社会总体,方法——使经验研究服从于理论研究,任务——对文化、世界观、意识形态等方面进行批判。由于阿多诺在提出辩证的社会学时,还是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所以他有时又把辩证的社会学称为“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阿多诺在这一时期最有影响的是出版了《否定的辩证法》一书,完整地为社会批判理论奠定了哲学基础。阿多诺之所以把自己的辩证法命名为“否定的辩证法”,正是要表明这种辩证法归根结底是以“否定”而不是以“肯定”(哪怕是包容了否定的肯定)为根本特征的。作为一种辩证法理论的否定的辩证法,阿多诺强调的是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用“非同一性”代替“同一性”,二是用绝对否定代替否定之否定。作为一种逻辑学、认识论的否定的辩证法,阿多诺要求“辩证地进行思考”,“在矛盾中进行思考”,具体地说就是:使思路摆脱形式逻辑的同一律,消除对一切概念的崇拜,提倡“反体系性”。作为一种哲学本体论的否定的辩证法,阿多诺强调的是,主体必须把一定的客体作为自己的认识对象,而一定的客体也必须有相应的主体的介入才成为被认识的对象,主体与客体相互不可分。作为一种社会历史观的否定的辩证法,阿多诺认为这种社会历史观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种历史理论,它的主要标志是和时代要求完全吻合,其彻底性就是和否定联系在一起,它总是“破坏性”的,它要求“否定的深度”,要求“割断历史的连续性”,甚至“在进步面前也决不停止批判”。阿多诺所提出的这种着眼于否定、破坏、批判的“否定的辩证法”,为西方社会极左派的“大拒绝”的政治路线提供了理论基础。

马尔库塞在法兰克福学派中一直被视为左翼激进理论家,他的左翼立

场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越加鲜明了。他所发表的《单向度的人》一书,被奉为“造反教科书”,该书与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一起为西方左翼学生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不同的是,《否定的辩证法》主要从哲学上加以论述,而《单向度的人》则侧重于社会政治理论。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首先批判了“单向度的社会”,这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这里的单向度的社会,是指一体化的社会,即丧失否定性、不再能够自我超越的社会。这一状态是通过鼓励人们单纯追求物质享受达到的。其次,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批判了“单向度的思想”,这是对现代哲学的批判。在他看来,不仅欧洲大陆的实证主义是肯定性的,就是欧美的语言哲学,也由于仅抓住语言的形式而不顾语言的历史内容,而陷入了肯定性,其原因在于当代哲学主要是以形式逻辑为基础的。马尔库塞在进行这种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革命新理论。他从革命目标、革命主体、革命方式等方面对他的革命新理论作了阐述。他认为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人的实现和人的解放。在他的理论中,人的解放、劳动解放和爱欲解放是一而三、三而一的命题。他强调,革命主体产生于工业社会势力范围之外,应从置身于“单向度的社会”那个大染缸之外的社会势力中寻找革命的力量。马尔库塞既反对改良主义、走议会道路,又不主张暴力革命。他赞同的策略被称为非暴力的反抗。他所说的“非暴力的反抗”就是进行“大拒绝”:拒绝一切劳作,拒绝充当帮凶,拒绝对暴君式统治者进行服从。马尔库塞对马克思某些理论的时效性提出了质疑。这些质疑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提出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时效性”问题,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剩余价值学说“过时”了;二是提出了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杠杆”的论断的“时效性”问题,认为在现代社会中,科技革命的一般社会政治进步作用已发生“逆转”,科技革命已成了压抑人的本能的罪魁祸首;三是提出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掘墓人”的观点的“时效性”问题,认为无产阶级不再是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力量,“新左派”才是新的革命主体。

弗洛姆晚年在理论上视野越来越开阔,不断越出早年的社会心理学的范围。在他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的各种研究中,最有影响的是他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研究。他力图向读者证明:以往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被大大地歪曲了。其中最为严重的歪曲,是把马克思误解为与人道主义对立意义上的“唯物主义”者。实际上恰恰相反,马克思着重强调的并不是物质的存在,而是人的存在,人道主义是马克思哲学的核心。弗洛姆对马克思人道主义的阐发,主要根据《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除此以

外,还有马克思的其他哲学著作的一些段落,包括《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等。弗洛姆强调,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或者“经济的”历史观,与那种把所谓的“物质的”或者“经济的”斗争当做人的最基本的推动力的观点,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它的确意味着人、现实的和完整的人、“现实地生活着的人”是历史的主题。可以把马克思的历史观叫做人类学的历史观,它把对历史的理解建立在人是“自己历史的创造者和行动者”这个事实的基础之上。弗洛姆认为,理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特别重要的是必须理解马克思的下述基本思想:人创造自己的历史,人是自己的创造者。除了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探讨,弗洛姆还研究了马克思关于“人的本性”、“异化”的观点,以及“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概念”。贯穿这些部分的一个核心思想,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独特性。弗洛姆还提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主要的批评不在于资本主义的财富的分配不公正,而在于资本主义使劳动堕落为被迫的、异化的、无意义的劳动,因而使人变成“残废的怪物”。所有这些思想的阐述,使弗洛姆不仅成了法兰克福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中人,而且成了整个西方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的主要代表人物。

施密特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成员中的杰出代表,被视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正宗继承人和捍卫者、法兰克福学派的“传家宝”。他是研究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出名的。施密特强调要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整体性的研究,不能把马克思的理论(包括其自然理论)仅仅归结为他的早期著作的观点,而是应从其后期成熟著作中的立场来理解马克思早期不成熟著作中的观点。施密特的结论是:马克思始终坚持,自然与社会是相互渗透的,而两者的互相渗透是在自然作为包含着这两个要素的实在之内部演进的。施密特认定马克思的哲学是一种“非本体论”,并对此作出了论证。他指出,马克思非但没有把抽象的物质作为世界的本原,而且根本就没有去探讨过世界的本原是什么这类“本体论问题”。由于马克思根本没有建立过什么本体论,所以也不能因为他不是把物质这种抽象体,而是把社会实践的具体性作为唯物主义理论的真正对象和出发点,从而就把马克思的学说称为“实践本体论”。施密特从认定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非本体论的”,马克思的自然观是“社会历史性的”出发,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提出了批评,但他同时又指出,不能因为批评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就从根本上否定自然辩证法的存在,他只不过是指出了马克思的自然辩证法与恩格斯的不同之处:马克思的自然辩证法是“实践的”、“非本体论的”辩证法。施密特在肯定列宁整个的哲学思

想的同时,对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所阐述的“反映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认为,列宁的“反映论”或“摹写论”同列宁的整个哲学思想是不协调的,同马克思的认识论是对立的。在他看来,列宁的“反映论”同马克思的认识论的基本观点相比较,一是具有抹杀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机械论倾向,二是具有把认识的主体与客体对立起来的独断论倾向。

20世纪下半叶,法兰克福学派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是哈贝马斯。他与施密特同属于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常有人认为哈贝马斯背叛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传统,甚至有人认为他背叛了马克思主义,投向了帝国主义阵营。实际上哈贝马斯不过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另外一翼,而且正是这一翼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处于隐性地位、因而被第一代学者忽视了的一面,建设性的一面。哈贝马斯提出了“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口号,他认为,重建最重要的途径是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理论补充“规范基础”。在哈贝马斯看来,马克思关注的主要是在生产领域中的学习过程,而没有注意到甚至在道德观的领域中,在实践知识、交往行动和用共识调解行为冲突的领域中,也存在着学习过程。我们不能像马克思那样,把理性逻辑与历史的一致仅仅限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考察。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代成员批判了工具理性,这也是不够的,还应当建构另外一种合理性——交往合理性。哈贝马斯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交往”的考察立足于劳动、立足于物质交往,哈贝马斯对交往的考察立足于语言、立足于道德和法律关系。在劳动和语言两个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确实主要研究了劳动,而哈贝马斯主要研究了语言。具体到人与人的交往关系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研究了物质交往,而哈贝马斯主要研究了语言交往。在《交往行为理论》一书中,哈贝马斯试图从近代的“认知—工具理性”回溯到古希腊的理性概念,并把它发展为交往合理性。通过他的四类话语活动和四类社会行为的划分可以看出,实际上在他那里,交往行为是其他行为的基础,而语言则成为三个世界的基础。正是交往行为使其他一切行为成为可能,正是语言使人与三个世界的关联成为可能。在哈贝马斯看来,如同交往行为是其他社会行为的基础一样,交往合理性也是其他次一级理性的基础。所谓交往合理性,哈贝马斯实际上把它当做一种语言性的、与哲学中主体间性相对应的、程序性的合理性概念。因此交往合理性具有语言性、主体间性和程序性三个特征。基于他的交往行为理论,哈贝马斯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构思了一个理想模式,提出了一种新的“乌托邦”。在他看来,现代社会的理想模式,应是一个以自由和平等的公民共同体为基础、民主地自我组织起来的

“规范”的社会,这一社会通过基于交往合理性的协议一致性,以便实现人类的解放。真正的理想社会只有建立在以主体间性为基础的交往理性基础上才是可能的。

四

探讨 20 世纪下半叶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概况,把注意力集中于原先的三大解释路向,是远远不够的。在 20 世纪下半叶的西方世界,还有许多其他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趋向值得探讨,其中有些在 20 世纪上半叶初现端倪,到了 20 世纪下半叶则迅猛发展成了有影响的派别,有些则完全是在 20 世纪下半叶新形成的。其中第四国际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应特别引起我们重视。第四国际理论家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社会理论方面,但实际上他们也并没有忽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在他们的政治、经济、社会理论中渗透着哲学的观点。如果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试图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哲学根源和政治经济学根源进行揭示的话,那么第四国际的托洛茨基主义则可以视为从哲学上和政治经济学上对第三国际晚期错误的揭示。至于这种揭示究竟正确与否,那是另一回事,但把科学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与其哲学、政治经济学基础的考察结合起来,无疑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思路,值得我们重视。如果说第一国际是与马克思的名字、第二国际与恩格斯的 名字、第三国际与列宁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话,那么第四国际理所当然地与托洛茨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第四国际的整个理论体系是由托洛茨基奠定的。1938 年 9 月 3 日,第四国际在巴黎正式成立,取名“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会议通过了由托洛茨基主持起草的过渡纲领,全名为《资本主义的垂死呻吟和第四国际的任务》,作为各国托派组织的基本纲领。托洛茨基主义形成于 20 世纪上半叶,但真正发生重大影响是在 20 世纪下半叶,尤其在西方世界。托洛茨基主义从形成那一天起,就与第三国际的理论,特别是与斯大林主义尖锐对立,这种对立既有政治理论方面的,也有哲学理论方面的。从研究的侧重看,斯大林主要阐发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方面,而托洛茨基主要阐发的则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方面。显然研究第四国际的理论,特别是研究第四国际的哲学理论,是从整体上把握 20 世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不可或缺的。

托洛茨基是第四国际的创立者和主要领袖,以“托洛茨基主义”来概括第四国际的理论是妥当的。尽管托洛茨基自称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列宁主